

原道

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所在命脉所在

■ 周敬青

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重大原则，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根本保证”，并用好红色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等方面工作对上海党的建设提出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

始终成为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定性。这个定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第一条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第一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者、开拓者、实践者。

建党10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也是探索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更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兴衰成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方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一帆风顺，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高风浪急的国际环境，尤其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需要我们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政治保障。

焕发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一大会址等红色资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三个务必’，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勇担历史使命，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个政党要不断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就必须构筑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拥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大厦。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在精神上立

得住、站得稳、守得牢，这个政党才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屹立不倒，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奋勇向前。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顽强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构筑起了我们党不断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和经验，面对新时代新征程，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我们党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始终牢记“三个务必”，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慎终如始开展好主题教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第二批主题教育临近收官，要坚持标准不降、劲头不松，把主题教育同各方面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要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学习贯彻转化为指导实践、推进工作的强大力量。通过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充分激发广大党员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真抓实干的工作热情，以强烈的历史主动和担当精神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建设一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这一重要论述，对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是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各项目标和任务的关键所在。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思路和模式，有效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在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上必须体现更高要求，不断强化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全球视野、战略思维、专业能力。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把那些愿干事、真干事、成事者的干部发现出来、任用起来，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氛围，培养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思路和模式，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我们党聚集中华民族的精英，具有崇高组织使命、严密组织体系、严肃组织纪律的高度组织化特点，展现出强大组织动员力、行动力、战斗力，具有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要切实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在深化基层党组织创新上更好体现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夯实我们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组织基础。

进一步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要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这一重要论

述，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通过培育党内政治文化、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今后，进一步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推动廉洁政治，形成廉洁作风。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廉洁文化，倡导领导干部廉洁生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人翁精神，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強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力万众一心、共克时艰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重大原则，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研究”前期研究成果）

思享

以绿色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

■ 黄树军 刘彦芬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将“绿色金融”作为建设金融强国的五篇大文章之一，要求优化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

新发展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发展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绿色金融进入了更为快速的发展阶段。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我国成为全球首个由政府制定系统性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国家。同年9月，我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峰会议程，开启和推动了绿色金融国际主流化进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了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3060”双碳目标，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2022年6月，原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要求保险机构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防范ESG（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提升自身ESG表现，同时充分披露绿色金融发展情况。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和国家政策推动下，目前，我国已形成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为服务实体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什么是绿色金融？《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从投资视角出发，认为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即为绿色金融。但目前学界对绿色金融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制度或工具，以可持续性为导向，将资金投向环境友好、低碳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核心作用是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推动环境保护、生态经济发展、引导消费理念的绿色化和金融业本身高质量发展。绿色金融追求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融、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统一，是金融逐利准则与绿色理念的有效融合，是对传统金融模式的突破性创新。

如果说新发展理念引领绿色金融发展，那么金融科技是绿色金融蓬勃发展的关键技术支撑。它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高新技术，在数据获取、识别、分析和可视化方面识别绿色实体、项目和产品，能够迅速采集并处理大量有关环境、能源等方面的核心数据，并且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为绿色金融提供精确、全面的数据支持与科学的决策依据，有效提升绿色金融信息效率的效率和普及程度，并正在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深刻改变着整个行业。《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明确指出，加强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数字绿色金融，运用科技手段有序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着力提升金融服务绿色产业的覆盖面和精准度。《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推动金融标准化工作数字化转型，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明确提出“建立ESG评价标准体系”，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

为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能量”

绿色金融主要通过市场手段将资源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倾斜，引导更

多的市场主体主动寻求绿色转型，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还有很多艰巨任务，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转型、绿色技术等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测算，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资金需求规模在百亿元人民币以上，靠政府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绿色金融作为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制度安排，必然要对经济转型发展提供相应的服务与支持，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到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从环境基础设施升级到自然生态修复，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在绿色低碳领域聚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绿色金融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绿色金融不仅仅是一种投资，还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强引擎。绿色金融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创造多元化的就业机会，推动新兴的产业的和市场的发展。尽管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态势良好，但绿色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还面临着多方面挑战，面向未来，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不断丰富政策框架，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政策支撑。一是不断完善绿色金融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绿色金融的定义、原则、标准和监管要求。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利于防范绿色金融市场风

险，推动绿色金融相关政策能够更好地实施，以及作用发挥的最大化。二是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推动金融机构和市场高标准发展绿色金融。绿色金融既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重要推动力，也是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心怀“国之大者”，引导银行保险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绿色能量”。三是创新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构建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体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催生新的、多样化的绿色金融需求。只有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步伐，才能更好地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四是加强绿色金融普惠性发展，促进发展的均衡性。为符合标准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支持，通过投放绿色贷款等方式，促进城市绿色产业蓬勃发展，大力扶持乡村生态旅游。

随着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建立，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日益完善，有效地支持了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意味着我国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将发生深刻转变。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也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作者单位分别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邢台学院）

新语

传承发展长江文化

■ 刘士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江之水万古奔流，千年文脉生生不息。羌藏、巴蜀、滇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这些诞生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区交汇融合、相映生辉，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留下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化，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长江文明概念的提出，与20世纪中国考古在长江流域的重大发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长期流行的是“黄河中心论”，认为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而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是从这个“中心”传播过去的。受“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的影响，不仅长江文明的源头被追溯到黄河流域，人们也习惯于用中原文化认知和评价长江文化。1995年，由李学勤和徐吉军担任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文化史》，向“黄河中心论”提出挑战，认为其“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同时用了大量考古学证据，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地区就有相当高度的文化，并得出长江与黄河同为中华文明摇篮的结论。在起源意义上把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区分开，不仅有助于发现中华文明在上古时期的丰富内涵和历史真实，也为构建多元一体、多根系一脉的中华文明新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与黄河文明双峰并峙的长江文明为背景，2004年，我们提出了长江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摇篮，并以着力破除主流的“中原中心论”为切入点，探索构建属于江南文化自身的理论、方法和价值体系。具体说来，以黄河文明为母体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土壤的江南文化，其核心则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两相比较，前者主要强调义与利、经济和伦理的斗争关系，而后者更善于处理和协调“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和个人”的关系，有助于构建物质追求与精神需求、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协调机制，这也是江南文化最独特的“经世致用”价值。就此而言，在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江

南文化必然成为推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融合发展的文化资源。

“世界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长江文化史是长江沿线城市发展史”。有专家统计，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辉煌历史中，先后产生了“60多座重要都城、几十座重要省城和2000多座县城”，其中很大一部分就分布在长江流域，它们的兴衰也主要是由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决定的。以肇始于秦代的成都为例，“于公元前311年筑城，城周20里，修整里阡，市张列肆，仿成阳制。城墙至宋代犹存，城内房屋华丽，街巷车马来往，街市繁荣。”（傅崇兰《中国城市发展史》）以宋元时期的苏州为例，马可·波罗说：“苏州城漂亮得惊人……居民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不仅供给自己消费，还行销其他市场……这里的商业和工业十分繁荣兴盛。”古代长江流域的大城市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城市”特点，不仅是政治和商业中心，文化艺术同样高度发达。因此，它们不仅是长江文明的摇篮，也是长江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消费的主要空间。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尽管城市群的紧密条件是交通紧密程度及经济与人口集聚水平，但从深层次和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群的形成离不开积淀深厚的区域文化。这是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群全都扎根于长江流域重要区域的文化根源。如巴蜀文化之于成渝城市群、荆楚文化之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江南文化之于长三角城市群、云南文化之于滇中城市群、贵州文化之于黔中城市群。就此而言，我们不仅要把握长江两岸城市和文化群作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主体，也应把它们看作是长江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载体和推动长江文化走向全面复兴的主要平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长江经济带 篆刻：王卫华